

孔祥毅文集

(四)

区域金融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孔祥毅文集

(四)

区域金融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孔祥毅文集/孔祥毅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 - 7 - 5096 - 4344 - 0

I. ①孔… II. ①孔… III. ①金融学—文集 IV. ①F83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4940 号

组稿编辑: 杜 菲

责任编辑: 杜 菲

责任印制: 司东翔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16

印 张: 233.75 (全九卷)

字 数: 3916 千字 (全九卷)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96 - 4344 - 0

定 价: 128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本书承瀚华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资助出版

本集目录

区域经济发展

山西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	3
山西轻工业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24
关于平衡山西财政收支、摆脱赤字困扰的思考	29
辛勤耕耘，再创税制改革新业绩	32
用金融创新理念营造山西经济发展的筹资环境	34
保险：一个待开发的市场	38
初论唐晋故地侯马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	47
金融支持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过去与现在	53

区域金融战略

重振山西金融业的雄风	67
关于山西投资与筹资战略问题	80
山西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87

省情研究的佳作 干部学习的精本·····	104
山西资本市场与投融资体系的问题及发展战略·····	107
寻找超常规发展的杠杆·····	124
山西金融机制创新研究·····	127
关于山西省“十一五”规划金融战略的建议 ·····	226
人身股能够为企业改革注入活力·····	229
以城商行为平台打造山西省金融“航母” ·····	238
营造山西金融洼地的战略措施·····	253
《草根银行的成长之道》序 ·····	261
晋商银行市场定位与发展战略的建议·····	265
转型跨越发展与综改试验中的金融支持·····	272
传承与创新晋商文化·····	283
新的时期山西还要掉队吗? ·····	286

区域金融中心

建设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需要建立太原金融中心·····	293
开拓金融市场，建立太原金融中心·····	300
太原市能否有一架大型“造钱机”? ·····	305
借差发行的山西金融·····	310
区域资金流量分析的若干问题·····	336
建设太原市金融中心的政策性建议·····	346

晋商之都

晋商之都的历史背景与当今建设的金融支持·····	355
以商业与金融创新，推进晋商之都的经济转型·····	364

专 访

谁让“金孔雀”东南飞·····	369
“金孔雀”能不能飞回来·····	373
用改革办法解决“金融腐败”·····	377
山西不能再等待·····	379

区域经济发展

山西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

背景说明

本文是为《三晋经济论衡》一书写的第一章“山西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为本书写的书评中讲道：“这是一部融历史、自然、经济、现状和未来于一体的综合性区域经济著作，也是迄今为止从理论到实践系统地研究山西区域经济的较大型著作，是山西第一部富有理论性的综合性区域经济专著，它为山西广大干部、经济工作者和青年学者了解省情，认识省情提供了学习的精本，同时也为山西各级领导指导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它标志着山西的区域经济研究已达到了新的水平。”

山西，因其位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我们的祖先已经生息繁衍了100多万年。他们由采集、狩猎、刀耕火种到使用今天的拖拉机、收割机，饱经了历史的沧桑，一代传一代，一代强于一代，创造了今日山西之文明；他们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并发展了山西社会经济。当时代进入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之际，当我们手擎山西先人留下的生命之火炬，肩负历史重任，寻求建设山西、发展山西现代经济方略之时，回顾一下山西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或许会使我们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悟出道理。

一、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这已是中国人的共识。山西人当引以为骄傲。

早在 100 多万年前，山西这块土地上已经有了原始人类，山西芮城县西侯度遗址，就是众所周知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它与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元谋猿人同属于一个时代。10 万年以前的山西人，已经有了比较集中聚居的村落，考古学家已经确定的山西襄汾的丁村文化和阳高县的许家窑人类化石及其遗址表明，那时的汾河两岸和雁北高原，曾是他们生息繁衍的地方。到 28 万年以前，原始公有经济的氏族公社就已在山西确立，在朔州出土的峙峪文化为此提供了佐证。至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可以说遍布全省，垣曲县下马村的陶盆、陶瓶，繁峙沙河的鱼骨文，太原光社的三足瓮等，都可以证明。

除地下出土文物之外，还有大量的古代传说以及我国最早的史籍记载可以说明，传说中的原始部落领袖尧、舜、禹都曾在山西建都。尧都平阳，即今临汾市；舜都蒲坂，即今永济市；禹都安邑，即今夏县。夏代存在于公元前 21 世纪到公元前 16 世纪。“夏传子，家天下”，是原始公社的解体，奴隶社会的确立。传说后稷教稼穡于稷山，嫫祖养蚕于夏县，推动了中国早期原始农业的发展。据《易·系辞》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反映的就是当时山西晋南地区发生的商品交易活动。到晋文公称霸年代，山西的榆次、安邑已是有名的商业集镇，对内使“工商食官”，对外使“轻关易道通商”。晋国的卿大夫代表了新兴地主势力，致力于封建改革，实行“作爰田”，废除土地三年分一次的旧制度，让耕者获得土地，使农业得到了发展。公元前 453 年，晋阳之战，赵、魏、韩三分晋国，赵都晋阳，韩都平阳，魏都安邑。魏文侯先后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实行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废除世袭禄位，不许无功受禄，分配国有土地给农民，抽取“什一税”，制定严格的刑法，建立封建秩序，促进了山西封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尤其是晋、魏的政治经济制度改革，使山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保持着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

二、民族边界和农牧业的兴衰

古代山西，是个民族杂处的区域。如羯族居今武乡一带，鲜卑族的拓

跋部居今代县、大同一带，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还有匈奴族、契丹族等。以农业为主的汉民族最先进入封建社会，而游牧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等族部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部落制度。各民族之间时有矛盾、冲突以至战争，但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友好互市、互通有无，进行着经济文化的交流，共同开发了山西，撰写了民族融合的友好史诗。

在山西的匈奴族，故地在雁门关以北，常常在长城内外与汉人发生矛盾。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族围困在白登山（今大同）7天，迫使西汉王朝不得不做出让步，遂逐步南下，牧马于吕梁山和汾河上中游地区。据《汉书》记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使马邑人（今朔州）聂翁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①三国时，山西境内的匈奴人分别以兹氏（今汾阳）、祁（今祁县）、蒲子（今隰县）、新兴（今忻州）、太陵（今文水）为中心，形成五部，达数十万人。“鲜卑酋长曾至魏贡献，并求通市。曹操表之为王。鲜卑之人尝诣并州互市。”^②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珪在平城（今大同）建立北魏，提倡分工定居，发展农桑，任用汉人知识分子，推动拓跋部学习汉人，向封建制度转化。至魏孝帝时，国力更盛，首都由平城迁往洛阳，改鲜卑姓为汉姓，改革其风俗、服饰、语言，鼓励本族与汉人通婚，制定官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而且也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今日驰名于国内外的旅游胜地大同云冈石窟和五台山的许多寺庙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遗物。

到了宋代，北宋政权与辽贵族（契丹）的关系虽然很紧张，但贸易往来并未中断。当时，不仅在并州（今太原）有交易市场，沿边一带仍有榷场，辽对宋在山西境内有朔州榷场、唐隆镇（今偏关东）马市；宋对辽在代州等地也设有榷场。北宋政府曾与辽贸易，“并州西边合河（今兴县）、保德北临（黄）河；夏人西来，辽兵南下，聚于麟（州）、府（谷）二州界上，对渡之合河、保德当中受敌，征调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羚羊角、硝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③。有时也管理很严。而在此同时，私市也很多，政府官员、投机商人和冒禁边民多设法避开巡检，

① 《匈奴传》，《汉书》卷九四。

② 陈灿：《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③ 康基田：《晋乘蒐略》卷二〇。

从事走私贸易。

明初，汉蒙关系曾一度紧张。边界交易中断，明政府构筑长城，驻重兵防御蒙古人南下，蒙古人民不能长期忍受“爨无釜”的艰难生活，经多次谈判，达成边界定期开市的协议。驻大同边镇的明王朝将领徐谓参与谈判后赋诗道：“千里赤兔匿宛城，一只黄羊奉老营。自古着棋嫌尽杀，大家和气免输赢。”在山西边境上的开关互市地点有得胜堡、杀虎口、新平堡、水泉营堡等。明代中后期，不少汉族农民前往内蒙古土默特、河套一带垦种。蒙汉两族人民共同开发了长城内外的大片耕田。明后期国内阶级矛盾上升，晋陕地区白莲教起义，影响到守边部队，山西起义者有农民、手工业者、贫民和戍边兵士，他们在举事失败后，就投奔内蒙古地区阿拉坦汗，而阿拉坦汗与明互市困难，就于丰州（今丰镇）一带，在汉人帮助下开发农耕，变丰州为半农半牧地区，1551～1570年，这里南来的汉人达5万多人，其中白莲教教徒1万人，有的还给子女起蒙古名。这些汉人从蒙古封建主那里领到土地，进行耕种，在黄河之东，黑河、灰河之间的大片土地上开辟了万顷良田。后来，又动员汉人工匠修城筑堡，发展成了后来的呼和浩特城（青色的城）。

三、山西古代的国际商道和山西商人

（一）进入丝绸之路

山西人从事国际贸易有悠久的历史，唐代时已进入丝绸之路。当时销往中亚一带的丝绸多数是山西潞安府的产品，其次是河南鲁山、山东潍县等地的绸子。当时高平、阳城、沁水的丝绸不仅进贡皇家，而且出口西域各国。除丝绸外，出口品有临汾的麻纸、太原铜制品等。这些商品沿太原—长安西去的丝绸之路，销往波斯、印度和阿拉伯国家。途中经过的山西灵石县有个“胡贾堡”，传说该村得名是由于其为西域商人往来旅居之处。

《通典·边防》中《经行记》说：杜环在天宝十年（751年）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被俘十载，他在食（今阿拉伯）的都城亚俱罗（即关德，今伊拉克境内），看见河东人乐、品礼两人正在织绫绢^①。著名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游历山西，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留下了

^① 庞义才、梁绍森：《唐代山西出口商品小考》，《山西日报》1982年10月31日。

这样的回忆：“这里（太原一带）的商业相当发达，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尤其是武器和其他军需品更加出名。这些军械，专供皇家的军队使用，十分便利……离开太原府，再西（南）行七天，经过一个美丽的区域（指晋中盆地），这里有许多城市和要塞。商业、制造业兴旺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过了这个区域，到达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市，叫平阳城，城内同样有许多商人和手工艺品，这里盛产生丝……”

（二）开创茶马之路

上述史实说明，山西人早在7世纪前已经介入了国际贸易，并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形成了国际商路。然而，更重要的是另两条交叉于山西南北和东西的国际商路——茶马之路，尚不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自古以来，中原汉民族生产和生活使用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使用的军马，主要取之于蒙古草原。而蒙古人需要的布匹、食品、铁器、日用品，则主要依靠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山西自然就成为这种南北物资交流的要冲。不论蒙汉民族间关系在矛盾冲突时，还是在和平友好时，这种非官方的民间往来，始终不断。到清初康熙皇帝统一内外蒙古以后，这种商品交易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山西人不仅从事蒙汉商品交易，而且通过蒙古地区与欧洲商人，特别是俄国商人建立了贸易往来，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互市。从此山西商人就北进俄罗斯，以至欧洲其他大部，直达彼得堡经商。到1917年在俄经商的山西人总数达3万多人，大部分是汾阳、徐沟等晋中商人，并且开拓形成了明清时代的山西南北、东西两条交会的国际大商道。

纵贯山西省境的南北商路大路是：福建、江苏、浙江和两广特产分别经水路运抵周口、汉口、樊城，然后用骆驼、骡马装载经河南、清化至泽州（今晋城）、潞安、子洪口运抵晋中的太谷、祁县、平遥，经必要的加工、分装后继续北上，沿着旧日的军事通道，经忻州、崞县，出雁门关，至山阴县黄花梁分作两路：一路去东口（今张家口），一路去西门（先是杀虎口，后为归化城），东西两口是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市场，两口以北是辽阔的牧区。出东口的物资，再经多伦淖尔、齐齐哈尔，到达呼伦贝尔草原；或北上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至恰克图。出西口的物资，一路北上库伦、恰克图，出俄国，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

堡，进入欧洲市场；一路到库伦后西行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进入哈萨克地区。

横穿山西北部东西商路基本上沿长城内侧行进，形成于明代。即由北京、张家口、天成卫（今天镇）、阳和卫（今阳高）、大同、杀虎口、榆林卫、包头、宁夏、凉州、甘州、肃州、敦煌、和田、叶尔羌、喀什噶尔，连接古丝绸之路，越葱岭，进入阿拉伯地区。

清末时，蒙古地区每年需要从内地输入砖茶 24 万箱（每箱 27 块），小米和大米 2482.1 万公斤，面粉 2778 万公斤，烟草 117.6 万公斤，糖 20.9 万公斤，酒 98.8 万公斤，还有各种布匹、绸缎、杂货、家具，如铁壶、小刀、鞍镫、提桶，寺院喇嘛用品如神像、僧帽、经书以及各种装饰品。每年又要从蒙古地区向外输出肉类 60 万担，羊毛 12 万担，驼毛 1.3 万担，马毛 1.13 万担，羊皮 50 万张，羔皮 70 万张，牛皮 8.4 万张，马皮 7 万张^①。输入输出蒙古地区的商品，绝大部分假山西商人之手，如山西榆次的常家大德玉、大美玉，汾阳牛家壁光发，太谷曹家锦泰亨，祁县王、史两家合作的大盛魁，乔家恒隆光，平遥蔚盛长等，由他们垄断了内外蒙古的贸易。

对俄国及欧洲其他地区的贸易，大宗的在恰克图进行。开始时年交易额约 1 万卢布。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输入 148471 卢布，输出 1383621 卢布。在 1845～1847 年以前，平均每年从蒙俄边界的恰克图输往俄国茶叶 4 万箱，1852 年达到 17.5 万箱。此外，还有“少量的糖、棉花、生丝及丝织品……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再加少量的俄国皮革、精致的金属制品、毛皮以及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所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达 1500 美元以上的巨额”。“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② 山西人在俄活动的地区主要有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克特斯克、克拉斯诺亚茨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纳乌、巴尔古今、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彼得堡。

（三）海上贸易

山西商人对外贸易的重点在陆路，但也没有放弃对海上贸易的竞争。清代山西介休皇商范家曾垄断中国对日本的生铜贸易 70 多年。介休张原

① 克拉米西夫：《中国西北部之经济状况》，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

村范家，在明代时已是“市易边城”的有名商贾，因其在清入关前就与满贵族贸易往来，清入关后，赐其为“皇商”，隶内务府籍，被清廷特许采办日本生铜，解决国家铸造铜钱用料的困难。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采购日本生铜由沿海商人承办，后范氏提出减价交售日铜的竞争条件，被清政府允准，每年从长江口出海，乘季风开往日本长崎，运中国生丝及丝织品、药材及土产等，换日本生铜，运回国内。参与这一活动的还有山西洪洞商人刘光晟等数家，年购铜约190多万斤，最多时达600万斤。在这一贸易中，山西的潞安党参，左权麝香和无名异，泽州芽香，大同香皮和石绿、花斑石、黄芪，汾州甘草，沁州石菖蒲，平阳龙骨，太原瓷器、天花粉等输往日本。

除对日贸易外，山西人还将金融机构设往日本。祁县合盛元票号将其分支机构设往日本横滨、大阪、东京和朝鲜的仁川，从事国际汇兑和融资业务。

（四）晋商精神

山西商人从事国内外贸易，被列为国内三大商帮（晋商、徽商、潮商）之首，世界经济史学界将其列于意大利商人之侧，称雄商界数百年。从客观上看，有其地理历史因素，如山西土地贫瘠，生计困难，不得不远走他乡，谋取什一之利；地处边塞，位居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民族农业地区之间，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要冲；地下资源丰富，手工业发达，铁器受到消费者欢迎，晋城缝衣针远销北亚诸国；明代实行“食盐开中法”，为北方边镇80万驻军筹措粮草，允许商人运粮食到边镇驻军之地，领取卖食盐的执照——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这一政策一经实施，山西人便捷足先登；宋、元、明时代山西几次大移民，诚如《诗经》所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离开家乡的流民有不少人走了商途。从主观上看，山西人不畏艰辛、敢冒风险的开拓创业精神，被西方学者称为山西精神。严格地讲，这是晋商精神。晋商精神可以概括为四点：

1. 重商立业的人生观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是历代政府的政策。“朝廷贵农，而不乐于种，朝廷贱商，而人日趋入市，则以商贾之利胜于农也。”^①当然，经商在外，“必远父母，别妻子，离乡井，淹日月，归来无时”，“幸获多

^① 《怡青堂诗文集》卷一。

资，走马牵车捆载而归，不幸则困死于外者往往也”。^① 经商在外是有很高风险的，然而人心思富，富商大贾“走运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出车骑，入则广厦，交接缙绅”，谁人不羡？故亲朋提携，乡友引进，络绎不绝，走上商途，逐渐在民间形成一种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种与传统观念相悖的人生观，是山西商业发达的思想基础。

2. 诚信义利的价值观

山西人与全国人民一样，历史上受孔孟之道影响，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思想指导下，对义和利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十分重视信义，又因乡亲关系，尊关云长为财神，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保佑自己的商业利润。在省内外建立的各类商业行会，均供奉关云长，全国各地的关帝庙大部分是山西商人捐资修建的。并且在商业行规内规定，“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反对采用各种卑劣手段骗取钱财，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故各地百姓，对山西人经营的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

3.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山西人多能不畏艰难，万里行贾，勤俭经营。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清人何秋涛《朔方备乘》说：“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商民俗尚勤俭，故多获利。”尤其是往来于茶马之路的商人，贩茶于福建、湖南、安徽、江西，销售于大漠之北，千山万水，穿沙漠瀚海，夏则头顶烈日，冬则餐冰饮雪，“饥渴劳病，寇贼虫狼，日与为伴”，年复一年，奔波于商途。经商于蒙俄、西亚和日本、朝鲜的山西人，更要克服语言和生活习惯的障碍，没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不可能称雄于商界的。

4. 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

山西人笃信“和气生财”，重视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在同业往来中，既要保持平等竞争，又要相互关照和支持。他们称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建立“相与”关系，

^① 《怡青堂诗文集》卷一。